

# 21 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能力辨析

冯立天 马瀛通

**【提要】** 本文以 2036 年为界,将中国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并揭示其人口学特征。再次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主要因计划生育而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在中国国情条件下不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本文还对 21 世纪中国老年人口社会保障能力进行了宏观分析,同时提出社会返还理论,揭示老年人口养老金收入的真正来源。

**【作者】** 冯立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马瀛通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在远未实现现代化之前,人口年龄结构就由年轻型步入年老型,这一人口学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和政府的关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界研究的热点。尽管其基本观点逐步趋同,然而对有关人口老龄化的若干基本理念,以及 21 世纪中国养老能力和养老理论等问题,仍有观念更新与再认识的必要。

## 一、有关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人口学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指按某一起始年龄定义的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的过程,所反映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征。老年人的起始年龄,国际上通行两个标准是 60 周岁和 65 周岁。

按后一个标准定义,根据中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老年人口比例 1953 年为 4.4%、1964 年为 3.5%、1982 年为 4.9%、1990 年为 5.6% 和 2000 年为 6.9%。预期 21 世纪初,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或超过 7.0%。应该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开始,与 70 年代初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是同步的。在步入 21 世纪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历了 30 年。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时就将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的提法是欠妥的,其错误是混淆了人口老龄化与年老型人口两个范畴。年老型人口是指老年人口数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达到或超过某一定义标准时的人口,所反映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按国际上约定俗成的标准,当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7% (按 60 周岁计算为 10%) 及以上时,就称为年老型人口<sup>①</sup>。人口老龄化可发生在年轻型、成年型、年老型这三种不同的人口类型结构中,即使在进入年老型人口后,人口老龄化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其时间长短,与其相应的人口结构由年轻型经成年型进入年老型所经历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时间越短,在人口老龄化年老型人口中持续的时间相对也越长。中国人口在 21 世纪初迈进年老型后,人口老龄化现象还将要持续约半个世纪才能消除。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人口现象,是人口再生产类型演变规律的必然反映。传统型人口再生产,其年龄结构要么属年轻型,要么属成年型;而现代型人口再生产

---

<sup>①</sup> 在人口学专业刊物中,一部分学者将年老型人口随意改写为“老年型人口”或“老年人口型”也是欠妥的,因为老年或老年人口有其定义标准,不能混用。

的年龄结构则属年老型。

一般说来,制约人口老龄化的主要人口学因素有:降低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或提高平均预期寿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在其年龄结构不变的条件下,与出生率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生育率愈高,出生率也愈高,出生人口绝对数也增加愈多,致使 0~14 岁少年人口加速膨胀,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就被迫下降,人口学上称其为人口年轻化。反之,则为人口老龄化。当人口老龄化全然取决于生育率或出生率下降因素时,这种人口老龄化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口绝对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是 65 年前出生的,甚至还有可能绝对量下降。由于老年人口是 65 年前出生尚存到今天的人口,其绝对量是早已确定的。虽然生育率或出生率下降引发的少儿人口比例下降,并由此衍生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但当今尚存的老年人口规模并不受其影响。可以认为,中国在 21 世纪初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7% 而进入年老型,其核心原因是 30 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初步完成了从高生育率向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的过渡。

虽然死亡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助长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但它并不是构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成因。况且,一般说来,死亡率的下降,初期通常表现为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其结果使婴幼儿存活率大幅上升,从而有利于少儿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非但不老化反而年轻化。在一定的生育水平下,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若源于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反而与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关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若源于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下降,其影响才会与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关系。

迈入 21 世纪以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将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停止下来。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在 21 世纪中的人口学特征,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2001~2036 年为前期,2037 年到 21 世纪 80 年代中为后期。前期人口老龄化,其初始年恰处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惯性增长依年代向前推进而加速衰减,0~14 岁人口规模依年代次序而绝对减少。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前出生的,处于盲目高生育率状态。少儿人口变动受其低生育率影响和老年人口变动受其出生时高生育率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急剧膨胀。后期的人口老龄化特征同前期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一样,也是处于低生育水平时期。一方面是少儿人口变动继续受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其规模继续变小或稳定在较低数量水平上;与此同时,后期的老年人口,由于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生的,其出生规模一开始就受到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控制,尤其是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受制于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影响,因此,此间的老年人口规模增幅逐渐放慢,乃至加速放慢。并于 21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将达到其峰值之后,即开始缩减。人口老龄化也将大体同步完成其历史使命。

从以上对中国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前后两个时期特征的分析中,不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2036 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前的相应年份出生的人构成。新中国未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时期,是持续的高出生率与加速降低的死亡率并存致使人口过快增长的时期,此期间盲目生育酿成的新增人口过快增长,65 年后又相应酿成老年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是历史形成的、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也是未能及早认识中国国情和人口发展规律对我们的惩罚。

第二,从人口老龄化角度考察,前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应归功于 20 世纪后 30 年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归功于由此导致的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转变的完成,以及审时度势地及时做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策。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实在是不堪的负担,因而建议提高生育率和出生率,以增大少儿人口比例来扼制老年人口比例的过快增长。类似这种观点和建议都是不妥的。凭借人口学的一般常识,只要稍加分析便知,若以提高生育率来扼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老龄化的速度虽然减缓了,但 2036 年前步入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却不会因人口

老龄化速度的减缓而有丝毫的减少。不少人误认为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也相应等于提高了其绝对量。众所周知,老年人口都是65年前出生的,在死亡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规模基本是客观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其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受其他人口构成比制约,老年人口比例或呈上升或呈下降。从抚养角度讲,我们抚养的是其绝对量(人数)而不是其构成比。提高生育率意味着增加出生人口规模,其结果是该抚养的老年人口非但不变,而且又增加了额外新增少儿人口负担,形成双重压力。如此下去,中国人口总量过多带来的种种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第三,2037年后到2085年长达半个世纪老年人口的衰减性演变,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的滞后积极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具有累积发挥作用的特征。

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波动起伏中由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演进,鉴于生育率高低是影响出生人口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中国在1971~2000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期间出生的人口,也呈现出在波动起伏中由高向低的变化,这种变化在65年后就相应形成了相似的2037~2065年间老年人口变化特征。21世纪头两个10年,由于继承了持续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将使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其父母是在全面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规模呈下降趋势,也是构成2066~2085年期间老年人口增加的绝对量衰减乃至消失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外有关人口理论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将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消极因素、一种障碍或“一堵墙”来看待的。早在1985年,本文作者之一就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理论创新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观点(马瀛通,1985)。这一观点在15年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与应用(马瀛通、冯立天,2000)。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再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客观必然,是实现人口良性循环的必然,具有规律性的性质,就不存在所谓“使我们陷入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老化的两难困境”问题(胡鞍钢等,1989)。

当然,我们强调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我们支持永无止境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因为这种认识是违反人口发展规律的。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年龄结构变动过程,既有始也有终。当实现人口稳定之时,也就是人口老龄化“寿终正寝”之日。稳定人口可分为三种类型:恒增型稳定人口,恒减型稳定人口和静止型稳定人口。鉴于中国国情,我们的人口目标战略只能在恒减型和静止型人口两者之间做出抉择。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暂且存而不论。

## 二、21世纪中国老年人口社会保障能力宏观分析

在21世纪里,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0.87亿要持续增加到2050年的2.6亿和2085年的峰值3.3亿,其后绝对量才开始下降。2050年中国要赡养的老年人口,相当于2000年2.99倍,到2085年,要赡养的老年人口相当于2000年3.79倍。老年人口比例从21世纪初约7%,先快后慢攀升到2085年约23%才停止继续提升,并转为缓缓下降。

中国在没有实现现代化以前,人口就步入年老型,而且在未达到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前,就成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于是,学术界和政界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的养老能力问题产生忧虑,认为这将构成21世纪个人和社会日益不堪的重负。如果用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未来的老年人口规模进行对比,确实令人担忧。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用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未来的老年人口规模相匹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察、分析、研究,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增大,老龄化程度提高,就必定出现保障能力短缺问题。

一些国家还属年轻型社会,老年人口比重很低,但却存在严重的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而另一些国家早已进入高老龄化程度社会,却具备高水平的个人和社会保障能力。因此,必须将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与本国相应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源的代际配置和制度的安排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中国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让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享受到与

当时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生活?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假定用符合理性发展要求的 GDP 规模、人均 GDP 及其增长率,代表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及其扩张程度,并按不同的但都具有可行性的 GDP 增长率,设计以下两个方案。

方案一:21 世纪 0 年代到 70 年代,各年代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6%、6%、5%、5%、4%、4%和 4%,80 年代上半期为 3%,则得出:2050 年的 GDP 相当于 2000 年的 16.74 倍;2085 年的 GDP 相当于 2000 年的 62.94 倍;人均 GDP 2050 年相当于 2000 年的 13.24 倍;人均 GDP 2085 年相当于 2000 年的 49.79 倍。

方案二:21 世纪 0 年代至 70 年代,各年代 GDP 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7%、7%、6%、6%、6%、5%、5%和 5%,80 年代上半期为 4%,则得出:2050 年的 GDP 相当于 2000 年的 22.23 倍;2085 年的 GDP 相当于 2000 年的 116.87 倍;人均 GDP 2050 年相当于 2000 年的 17.58 倍;人均 GDP 2085 年相当于 2000 年的 92.46 倍。

结论非常清楚,即使按 GDP 增长率稍低的方案一测算,当中国总人口处于峰值区域的 2050 年时,其按人口平均的经济实力比 2000 年增长 12.24 倍,换言之,人均 GDP 将由 2000 年的 7 063 元,增加到 2050 年的 93 514 元。当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峰值的 2085 年时,人均 GDP 将比 2000 年增长近 49 倍,即达到人均 GDP 351 691 元。由此可见,从经济实力看,完全有能力保证未来总人口或老年人口规模处于峰值年时,让老年人享受到与当时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体面的经济生活。况且,由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大大减轻了少年儿童抚养负担,就更有利于加大国家、社会和个人自身的养老能力。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中养老基金的真正来源

众所周知,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是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提供了经济前提或经济基础。切实地解决好老年人口问题,还有赖于理论界和政府各级决策层不断地深入探索相关养老方面的理论,因为这是理性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前提。

养老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经济供养问题。老年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有劳动能力但却失去了谋求生活出路的劳动手段,可是又必须要有相应的收入才能生存下去,因而涉及到相关老年人口经济收入来源理论问题。

迄今为止,有关老年人口的收入来源理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是家庭代际交换理论;二是社会代际交换理论。

家庭代际交换理论认为,父母抚养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由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实质,是指望日后自己进入老年后获得子女赡养权的投资回报。这种养老方式由家庭世代相传,形成了一条家庭代际交换链,即家庭代际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只适宜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可以用之来解析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为什么在还未摆脱二元经济结构状况下仍主要靠家庭养老的原因。

社会代际交换理论认为,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由社会整个成年一代负担起对老年一代的赡养,其方式是通过发放社会保障金(含养老金)的办法,来保证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即把家庭代际交换关系升华为社会代际交换关系。社会代际交换理论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当家庭生产方式逐步扩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时,养老方式也伴之由家庭代际范围逐步扩展为社会代际范围。这一理论可以用之来解析为什么中国城市地区主要是社会养老模式(指经济来源)而非家庭养老模式的原因。

然而,社会代际交换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也是不公正的。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它把社会养老金的支付看做是来源于成年一代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因此,很容易形成社会成年一代

赡养老年一代的错觉与错误观念。这种错觉与错误观念影响颇深颇广,所以社会才普遍把赡养老年人口当做社会的负担。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通过发放社会养老金的方式保障老年人的收入,形式上似乎将负担落在了成年一代身上,但其实质依然是老年人在自我养老,只不过这种自我养老采取了社会化的方式,不易被人们知晓。

老年人在其处于劳动年龄时,他们获得的报酬理应包括三个部分:(1)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须的费用,以保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2)抚养子女费用,以保证社会范围内劳动力更替的需求,即劳动力的代际延续;(3)维持自身丧失劳动力后的晚年生活费用。但是,实际所得报酬基本上只包括前两部分,第三部分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社会所占有,待年老后再由社会以发放养老金(退休金)的方式返还。可见,老年人现在所获得的养老金,是自己在年轻时为自己创造的必要产品的一部分的返还,而非现时成年一代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的再分配;是老年人自己养活自己,而非现时成年一代养活老年一代。这在理论上是必须分清的,否则,理论上的混沌必将掩盖社会养老基金的真实来源,扭曲了在职族与退休族两个族群之间真实的经济关系,并有可能导致退休族这一弱势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应当摒弃在养老问题上的社会代际交换理论,而还其“庐山真面目”——社会返还理论。

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社会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乃至改革开放后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体系及其营运(保值增值)制度,以致造成现实退休族群所领取的养老金,是从成年在职族及其单位按期缴纳的社会养老基金中支付的,这确实给人以成年一代在养活老年一代的错觉,也必然造成养老基金支付上的巨大缺口,而且随着退休族群体规模日益增大,这个缺口也愈来愈大,不得不由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加以解决,而当年财政收入则是成年在职一代创造的剩余产品归国家集中分配的部分。

从现象上看,现实老年人所领取的社会养老金来源于成年在职一代的劳动成果,这种认识似是无可厚非的。但当人们深究一下,老年一代在其成年在职期间政府应当预留而未预留的社会养老金哪里去了?回答是明白无误的,就是通过各项税收转化为当年的财政收入,并通过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上去了,是国家欠下的社会养老基金的巨额历史债务,当然这项债务不应由成年在职一代偿还,应当从过去经济建设成果沉淀下来的国有资产中划出相应的部分,来弥补上述社会养老基金支付的巨大差额。其具体途径是通过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减持,将其变现部分拨归社会养老基金,借以平衡基金收支,并由基金独立运营,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这是政府解决社会养老基金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举措,这一举措的出台,也是从实践上给社会返还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支持。

#### 参考文献:

1. 马瀛通:《论人口老龄化过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全国计划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1985年。
2. 马瀛通、冯立天:《三大人口高峰与中国现代人口转变》,《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2期。
3. 胡鞍钢等:《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

(责任编辑: 朱 犁)